

“阴盛阳衰”，男孩的父亲有责任

9

热点关注

儿子上小学，我去学校开过几次家长会。40多个家长，包括我在内，男家长只有三四个，有时一两个，真有凤毛麟角之感。看别的班级，情形也差不多。开始我觉得很惊奇，何以如此呢？别的父亲都在哪里呢？次数多了，也就有了一点自我解释：或许是别的父亲都很忙，又或许别的父亲都是运筹帷幄的，像开家长会这样的小事，母亲来听听就可以了。

校内如此，校外似乎也没什么两样。我儿子从小学二年级起，就分别在两家校外培训机构上课，我和他妈妈都登记了联系方式。无一例外的是，每次有事，总是通知他妈妈，根本没我什么事。我怀疑这是一种深刻的偏见，理不应如此的。后来陪儿子上课，才知道是自己没见过世面，人家培训机构比我高明得多，或许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实际上，不管你到哪个培训机构去考察，替孩子选课报名的，陪孩子听课的，十有八九都是妈妈。有事找妈妈，正是切合实际的行动逻辑。

我身上却可能真的有一种偏见，认为孩子若是男生，则父亲应多操心；若是女生，则母亲应多操心。这种偏见的形成，可能受到科学知识的影响，而更多的则来源于常识和经验。据有人说，即使家有女生，也不能没有爸爸的拥抱和关注，因为这“至少会直接影响到她将来怎样判断男友”。这样的主张大约也有科学依据，不过我对此没有丝毫心得。我稍有认知的，是不少儿子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父亲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和应有付出。

如果说孩子是太阳，那么围绕这太阳旋转的就应当有两颗行星，一颗是父亲，一颗是母亲。但如上所说，很多男孩在学习成长中，往往只见母亲这颗行星在环绕，父亲则仿

佛在遥远的天际自转，难得一见。我相信，在难以观察到的家庭空间，陪孩子做作业、检查孩子作业、整理孩子文具、照料孩子起居的，也大多以母亲为主。人们称颂母爱的伟大，很多男性名人、伟人在回忆中总会谈到女性（母亲或祖母）对自己人生的积极影响，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也完全当之无愧。母亲独任教育子女之责，似乎也是一种久远传统，“孟母三迁”和“岳母刺字”的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好在还有一个“曾子杀彘”的传说，没使父亲的颜面尽失。

现今的幼儿园和小学，老师以女性为主体，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很多幼儿园，你甚至不能发现有一名男性老师。男孩在这种环境中步入人生的初始阶段。倘若在家庭教育中，又以母亲为主，男孩则几乎只能受到女性的熏陶。儿子上幼儿园中班时，来了一个插班的男孩。他们放学后在一起嬉戏，那男孩因环境陌生，略显胆怯不奇怪，但说话的腔调、遇到同学开他玩笑便躲到妈妈身后的举动，都会让你觉得他不大像个男孩，而他的性别又明明告诉你他是男娃。

如今的男孩不少都染上了“娘娘腔”，长大后甚至不及女生勇敢，社会有识之士深以为忧。不过，人们在反思时，往往从大背景着眼，比如提高幼教待遇以吸引男性加入，却很少从家庭的角度加以审视。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有一个“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自求而至，不为而成。”这里说的虽然是学校，其实也适用于家庭。在校外、在家里，如果“前导”的总是母亲，男孩“从游既久”，虽不至于变成“雌鱼”，但“濡染观摩之效”一样“不自求而至”，他会

更多地像母亲而非父亲，简直就是一种必然。

但男孩呈现女性化倾向，或许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如果父亲既不与儿子一起面对他作业中的难题，又不与儿子一起解决他和同学交往中的困惑，也不与儿子经常心平气和地促膝谈心，那么，他与儿子的关系就会逐渐疏远。如果对儿子不教而管、不教而打，那么就和不教而诛一样不得要领，缺乏正当性。

在儿子小的时候，母亲独力承担教育重任，表面上还能勉强应付，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因性别不同，儿子与母亲的交流也会发生障碍，而母亲对管束儿子的有效性也会越来越缺乏自信。我知道几个上了初中的男孩，因为父亲长期不在身边或很少过问他们，对母亲的教诲根本置若罔闻，基本上处于放任状态。父亲知情后痛打一顿又如何？过不了几天，又是故态复萌，还是在外游荡，惹是生非。

当今社会，似乎还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宰的结构。虽然很多女性在不同领域都做出了男性难以比拟的成绩，但“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还颇有市场，带孩子（无论男孩女孩）成为母亲一个人的责任就是明证。很多父亲都很忙，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借口。我所知道的一些父亲，宁可在单位和同事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或是和朋友喝一通酒、划一通拳、打几圈牌，也不愿花时间和儿子谈谈天、说说地，或是看一档少儿节目、上一趟承诺已久的游乐园。但有的父亲的确是忙，忙事业，忙升官，忙赚大钱，早出晚归，披星戴月，飞来飞去，无有竟时。只是，忙来忙去，结果又能怎样呢？若说得刻薄一些，或许不过如聂绀弩所言：“自信平生无短处，短在庸凡老始知。”

有时，我也劝有的父亲，如果事

业价值和家庭价值发生冲突，一定要努力找到一个平衡点，即使没有充裕的时间，下班回来哪怕陪儿子散散步、聊聊天，效果也胜过等他出了问题才正襟危坐、疾言厉色地说一通。有一个男孩，从小由爷爷奶奶带，不好好学习，还沾染了不少毛病。他父母觉得不能这样下去，就在上初中时实行了“接管”。从此，这位父亲几乎每天都苦口婆心地进行教育，甚至通宵达旦，但效果并不好。如果提前若干年介入，或许就不是后来那个样子。

爱因斯坦和爱迪生经常被提及，但人们对他们的后代却知之甚少。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刚当上父亲，每天除了科学研究，还要抽时间照顾孩子。人们经常看到，爱因斯坦一边推着婴儿车，一边思考研究课题，记录数学方程式。结果，他的儿子个个有出息。同样举世闻名的爱迪生，在教育子女方面却要逊色得多，而他的子女也无一有成就。他认为：“只要有雄心壮志，任何人无需上大学就能在事业上干出一番成绩。”事实上，除了这样的信念，爱迪生还将绝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实验室里。他们同样伟大，但作为一个父亲，我更欣赏爱因斯坦，他不但用智慧推动了世界的巨大进步，而且培养了为社会继续创造价值的后代。

1919年，鲁迅写了一篇大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主要讨论的是转型时代的家庭变革和父子关系重建等大问题。其中有些观点，如父母对子女应“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虽然时代已大不相同，但仍有指示价值。不过，如果说鲁迅的话题具有现代性，我们当下所面临的困境或许还停留在“前现代”。毕竟，只有有了做一个好父亲的责任、决心和行动，才谈得上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父亲。



滕朝阳 著
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然而，太多的自以为是，太多的似是而非，太多的跟风盲从，使很多为人父母者至今未能成为这一理念的自觉践行者。著名教育专栏作家滕朝阳用实际的育儿经验告诉年轻的家长们，家庭教育是成长无可替代的奠基，而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于子女成长具有母亲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反思管理孩子的经验以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并上升到教育理论，从中发现很多有益的经验，对家庭教育很有帮助。

[上期回顾]

做父母的有义务培养教育子女，却没有义务为子女承担教育责任。既生之则育之，应是每一代人都应当贯彻的原则。

第一次上春晚前，感觉天天在背台词

7

名人传记



朱军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朱军首次披露自己数年来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台前幕后，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朱军在书中回忆了那些属于他自己的“零点时刻”：荣光时、黯然时、欢歌时、悲泣时……每一时刻的感悟，都使他的生命愈加厚重。

在书里，朱军将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突出重围，战胜对手，成为央视晚会的当家主持？他和范曾、赵本山、周涛、董卿、冯巩等人的情谊，以及春晚舞台上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上期回顾]

我到甘肃电视台当主持人后，名气开始响了，还有机会和央视来的“大腕儿”合作，比如倪萍和杨澜。杨澜还提议我出去走走，以便有更好的发展。

杨澜走了没多久，中央电视台的《地方文艺》摄制组就来了。在录制节目的间歇，一位年轻干练的女同志和我聊了两句。我礼貌却略随意地回答着。“主持得不错，有时间我们聊聊吧！”我点着头，心想，这女子口气不小。这位女同志走后，一位同事望着她的背影神秘兮兮地问我：“知道她是谁吗？”我摇摇头。

“这可是中央电视台的高导演啊。你刚才对人家也太冷淡了吧！”当时的我沉浸在小“富”即安的满足中，对事业和生活都没有太大的野心，所以我并没有为刚才的“失礼”而懊恼。不过得到了央视导演的认可，我还是喜不自胜。愉快的合作过后，高导演也撂下了一句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然后把电话号码留给了我。现在回想起来，白凤、杨澜、高立民导演……好多人或无意或有心肯定或建议像是一站站路牌，一路指引我走上了中国电视晚会的大舞台。

1993年年底，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导演的电话，她邀请我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导演提议我出去看看后，我总是隐隐有种冲动。这次，我没有犹豫，背着简单的行囊就去了北京，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北漂。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东西南北中》正在物色一个男主持，我就这样幸运地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成了一名编外人员。

1996年3月8日是一个大好日子，就在这一天，我成为了中央电视台的一名正式员工。1996年，我已经32岁了，正介于不老不嫩的年纪，《东西南北中》《中国音乐电视》似乎越来越不符合我的风格。我的舞台在哪里？会有一个新的舞台吗？当我

带着这样的困惑环顾四周的时候才发现，当时台里的文艺节目主持人其实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记得有一次《东西南北中》要筹备教师节晚会，主持人全部邀请了外援。我当时心里暗自不爽，明明有自己的主持人还要去请别人，这不摆着说自己不行吗？我和杨东升导演关系不错，在他面前无须掩饰什么不满情绪，我直言不讳地跟他表达了这种想法：“咱们自己的晚会为什么不用自己人？”他无奈地苦笑着说：“用谁啊？用你啊！”“用我啊！”“你还嫩了点！”想想我都三十多岁了，算上军龄也工作了十几年，我愤愤不平地说：“你都不让我上台，怎么知道我还嫩？你得看台上的表现才知道啊！”他安抚道：“你别着急嘛，急什么，机会总是有的。”

机会总是有的，只是不多而已，所以每个我都倍加珍惜。当时的我在央视只有过两次直播经历。第一次是在1994年9月30日，我参与了建国45周年天安门广场群众联欢活动的现场直播。台里一共安排了近10位主持人在不同地点向观众进行现场解说。我在正阳门下，负责礼炮礼花分队的相关报道。这和前一站的集体舞比起来显得冷清不少，为了保持直播气氛能连贯地衔接起来，我提前几个小时就开始热身，围着正阳门跑了一圈后，我又在原地做起了高抬腿。大家都笑话我：“瞧把朱军紧张的！”事实证明，这样做

的效果还不赖，当我带着运动过后轻微的喘息，在镜头面前绽放出全部热情的时候，当晚的总导演张晓海惊讶地问道：“这个小伙子是谁？”当时《东西南北中》的主题曲《走到一起来》非常流行，他只知道我是“走到一起来”的那个小家伙，从这之后他才记住了我的名字。

国庆直播之后的第二天，张晓海导演再次找到我，通知我和《艺苑风景线》的陈鲁豫一起主持一台《七彩欢歌》的行业内晚会。这也是我首次在当时央视最大的1000平方米演播室主持，这里也是每年春晚的直播地。为了缓解我的紧张心理，张晓海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了都是你们的，错了都是我的，希望你们能掀开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新一页！”

翻篇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机会总是愿意拥抱奋力向它奔跑的人。1996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我在国际饭店主持了一台中秋晚会。这台晚会的导演是袁德旺先生，作为文艺中心的资深导演，《综艺大观》是他的著名作品。熟谙电视文艺晚会沟通艺术的袁导演将这台中秋晚会的会场特意设计成了茶座式，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互动联欢一次次将气氛推向高潮。作为主持人，我发挥自己在部队中练就的本领，不仅负责说，还在现场当起了一位魔术师的助手，就跟刘谦和董卿合作的感觉差不多。两人合作表演了变金鱼缸、变火盆等中国古典戏法，我还现学现卖地表演了一个魔术，主持人反串在当时是很新鲜的，我的表演引来了观众的阵阵喝彩。

转眼就到了年底。我正在办公室制作《东西南北中》的春节特别节目，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朱军吗？我是袁德旺，我正式通知你，你现在是1997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之一了。”我以为是自己出现幻听了，不敢相信地问道：“您说是春晚吗？”他回答得斩钉截铁，容不得丝毫怀疑：“对，就是春晚，你看什么时候到梅地亚来一趟，咱们面谈一下。”那时候五棵松的影视之家还没盖好，春晚节目组驻在梅地亚，“好，您在哪个房间，我就去！”放下电话，我

直奔梅地亚。见了袁导，他像老朋友一样拉着我的手嘱咐我说：“小朱啊，要把握好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们相信你！”

机会来了，来得如此之快，快得令我有些不适应，那个在中国电视文艺主持人心中相当于喜马拉雅山高度的大舞台将有我的立足之地吗？直到亲临春晚排练现场，直到亲眼看到赵志祥和程前，我才确信自己终于来到了春晚身边。

毫不夸张地说，赵志祥老师一直是我的职业偶像，多少次做梦我都想和他站在同一个舞台上。程前当时人气很高，他是我到了央视以后第一个想要追赶的现实目标。只有我和亚宁是第一次参与春晚。作为新人，每遇到问题，比如生僻的字拿不准，我就会去向赵老师，他总是认真地指导，同时赵老师还担当着春晚主持人团队中大家长的角色，负责把控总体的主持节奏，他会时不时地提醒我们：“小弟兄几个，咱这段节奏可以稍微放缓一些。”有一次排练完毕，我兴奋地问倪萍老师：真正直播的时候我们会在哪里对词啊？没想到，倪萍老师指着后台的一个狭长通道说：“咱就在这儿背词。”其实，来不及换服装的时候，那也是我们的更衣室。那个通道也就1米来宽，是舞台大幕的后方与墙壁隔出来的，我们就在那儿借着舞台透过来的光来回溜达着熟悉台词。

这也使得我第一次对春晚主持人有了了解：舞台上的光鲜都是表面的，背后更注重的是专业上的精准。每次排练都会有旧的节目拿下去，新的节目加进来，所以每次的台词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更不能把台本拿走，每次排完都要还给导演组，回家还要凭印象回忆，于是那段时间我感觉天天都在背台词。